

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與 「中國學派」之倡議

廖文義

育達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中國崛起」是近十多年來國際關係與政治所注目的焦點之一，中國大陸不但在軍事、政治、經濟或整體綜合國力都有明顯的提升，還試圖打破傳統上西方主導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局面。中國大陸學者正思考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以及「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希望逐步落實 2003 年 8 月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會議上所強調的，學術界應該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大陸學者提出四種途徑，分別為學習西方的實證主義；借鑒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國際關係思想；以中國傳統東方文化為核心；學習「英國學派」等。

站在學術立場，我們很樂見「中國學派」的建立，因為能多一種提供分析問題的不同角度。然而，「學派不是自封」，必須正視建立「中國學派」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缺乏一個明確的研究綱領，以及具代表性的學派人物。倘若這樣的問題未能為主張建立「中國學派」者克服，那麼「中國學派」將是一種口號、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

關鍵詞：中國學派、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Initiative of Chinese School

Wen-Yi Liao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Yu Da College of Business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a focus point am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past decade. Mainland China not only has obviously rapid growth in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has been trying to break the situation that the Western country (U.S.) had dom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a long time. Nowadays, Chinese scholars are thinking how to set u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Chinese school, to fulfill what Hu Jinto said in 2003 that the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create cultural achievem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setting u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cholars consider there are four optional approaches, which include respectively 1.learning positivism, 2.based on the thought of Marx, Leni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3.based on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4.and learning English school.

In terms of academic community, we hop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chool, which can provide u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analyze problems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hinese school, however, those who declare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school should have to face seriously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ing of a research programme and typical scholars. If they can not get over these difficulties, building a Chinese school will be a dream or slogan.

Key words: Chinese Schoo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壹、前言

國際關係是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說。所謂古老，是因為國際關係理論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古希臘時代 Thucydides、Plato、Aristotle 等人的思想，但 20 世紀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對國際關係的論述大多零星地散見於他們的歷史學、政治學、地理學、哲學和法學的著作當中。所謂年輕，是因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就是 1919 年英國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才設立第一個國際關係的課程。國際關係學科發展至今越趨成熟，歸功於國際關係理論獲得肯定。不過既有的國際關係主要還是由西方理論所支配與主導，非西方理論總是被忽略。Stanly Hoffman (1977) 就曾不諱言的表示，由於國際關係在美國出現與崛起，且因為美國的政治優勢，使得國際關係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American Social Science)。的確，如果我們簡略的檢索重要的國際關係期刊，如《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際研究評論》(*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發現對於國際關係的相關探討大多數圍繞在「美國」議題上，至於「非美國」議題的文章佔少部分，而論及「非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更是少之又少。或許如同已故英國學者 Susan Strange (1995, 164-165) 所言，「就像美國報紙與電視新聞節目那樣表露出對外國新聞幾乎完全缺乏興趣——當然除非美國軍隊捲入或可能捲入其中，大多數美國學者的學術作品也習慣於對外部世界的思想和觀念置之不理(deaf and blind)。」這也間接的說明有關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中國大陸作為非西方大國之一，最近十多年來除了在經濟、軍事、政治與整體綜合國力有顯著提升外，還試圖打破國際關係學科西方理論獨霸的現象。中國大陸學者正思考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以及「中國學派」(Chinese School)的國際關係理論，¹希望逐步落實 2003 年 8 月胡錦濤 (2003)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會議上所強調的，學術界應該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本文研究之目的乃在於深入瞭解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以及中國大陸學者倡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等相關議題。本文分為三個部份。第一，

¹ 若從相關文獻內容來看，「具有中國特色」與「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兩者所指的是同樣一件事，只不過最近 2-3 年來，「中國學派」一詞比較被中國大陸學者廣為使用。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學派」給人感覺較學術性(如「英國學派」)且涵蓋議題範圍較廣。

論述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發展歷程。第二，中國大陸學者對「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第三，分析「中國學派」創建的問題。

貳、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發展歷程

1949年10月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後，周恩來（1990，1）於11月8日中國大陸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提出建立國際關係學科的構想，而此構想首先落實在人民大學²外交系的設置上。1950年1月人民大學成立包括外交系在內的八個學系，外交系主要功能乃培育外交人才，該學系首屆招收學生達100多人（張歷歷 2003，37）。1955年9月人民大學在外交系的基礎上成立外交學院，第一任外交學院院長為當時中國副總理陳毅（張歷歷 2003，37）。整體而言，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對於國際關係學科的設立僅是極少數，課程的教授承襲蘇聯模式，若干外文翻譯書籍也比較零散，只作為決策部門的內部參考。就制度的設立、政府預算的投入、大學正規學科的設置等三方面來說，那段10年時間可看作是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研究上的「前史」（王逸舟 2004，138）。

1960年代初期，由於中國大陸與蘇聯之間的衝突加劇，中國大陸領導人開始關注國際議題的研究，並成立更多國際關係相關科系與研究單位（Song 2001，62）。1963年12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加強國際議題研究的決定》文件，之後主要大學如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紛紛設立國際政治系，且在政府不同部門的控制下成立十個國際關係的研究機構（Geeraerts & Jing 2001，253-254；Song 1997，40）。針對當時國際問題，三所大學的國際政治系進行分工研究，人民大學以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為主；北京大學專攻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問題；復旦大學則以美、歐、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王逸舟 2004，138）。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嚴重衝擊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與國際關係的研究，因為除了造成從1966年至1971年大學無法招生外，有些甚至被迫解散，例如1969年人民大學外交學院被解散，大部分教職人員下放勞動。那些尚存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人員，也僅能偷偷研究與加強外語能力（張歷歷 2003，38）。簡要的歸納1950年、1960年這二十年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特色，在於第一，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為指導研究的方針，探討中國大陸如何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立足；第二，國際關係研究主要服務於國家外交以及國際的鬥爭；第三，關心的議題是國家安全

² 1949年11月12日劉少奇建議中央以原華北大學、革命大學、法政大學三校合併為人民大學。12月16日則通過此項建議。1950年1月人民大學成立，2月招生，4月正式上課。

(程毅 & 楊宏禹 1991, 22-23)。這樣的研究型態一直到 1980 年前仍是主流，也因此許多中國大陸學者認為，1980 年以前，中國大陸沒有真正教授國際關係理論，而當時所謂國際政治理論，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寧與毛澤東等理念的介紹，大學課程的設計主要在解釋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如帝國主義論、殖民論、戰爭與和平論等 (Song 1997, 41)。換言之，儘管當時中國大陸已有國際關係相關科系與研究機構，不過還談不上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1978 年 12 月中國大陸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除了針對經濟與政治等多方面進行改革外，且在國際關係研究上也呈現不一樣的型態，因為不再侷限於專研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試圖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接觸並引進。1979 年 3 月鄧小平曾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85 年 8 月中共中央頒佈《關於改革學校思想品德與政治倫理課程教學的通知》，強調除了要求大學學生應該了解馬克思相關思想與理論外，還要向他們介紹當代世界政治的現狀、國際關係的基礎知識。³這促成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人民大學、外交學院、南開大學等開設國際關係相關課程，而課程的內容逐漸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接軌 (倪世雄 & 許嘉 1997, 12)。

與之同時，許多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也孕育而生。1981 年陳樂民撰寫一篇題為〈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章，為中國大陸最早介紹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1985 年陳漢民所著的《在國際舞臺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概說》一書，是第一本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專書。1987 年倪世雄與金應忠主編的《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文選》一書，則是第一本比較全面性介紹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如 Hans Morgenthau、Kenneth Waltz、Robert Keohane 等重要大師思想與理論。1987 年出版的《爭辯中的國際關係理論》(*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中國大陸最早翻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兩本著作 (倪世雄 & 許嘉 1997, 11)。若與改革開放前比較，1980 年代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有三點特色：第一，思想指導原則的改變，放棄原先遵循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主張，轉而遵循鄧小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亦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第二，引進並介紹西方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與歷史。第三，國際議題研究的範圍擴大，除了傳統國家安全議題之外，對國際政治秩序與經濟方面有著更深入與全面的瞭解。

1990 年代初期蘇聯勢力的瓦解，代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兩極體系也宣告

³《中共中央關於改革學校思想品德與政治倫理課程教學的通知》，1985 年 8 月 1 日。

瓦解。這樣的巨變不但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造成衝擊(質疑現實主義無法合理解釋、歷史終結論的出現),也影響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從 1990 年起至 2006 年為止,這段期間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與 1980 年代相比較,呈現如下幾方面明顯的進步。首先,設置國際關係相關科系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明顯地增加,根據至 2006 年為止的統計,中國大陸擁有國際關係相關科系的大學與研究單位已達 83 個,(表一)突顯出國際關係逐漸成為一門「熱門科系」。其次,除了持續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外,例如 1998 年王逸舟的《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與歷史》,以及 2001 年倪世雄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兩本知名著作,對於國際關係議題的研究已朝多元化邁進,研究內容大致可區分為理論、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世界政治等三部分。(表二)。最後,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學者試圖與外國學者對話,「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是一例。當 Samuel Huntington 於 1993 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提出「文明衝突」的論點時,中國大陸學者則提出不同的觀點加以反駁。有學者從「文明」的概念批評,認為 Huntington 對於「文明」概念的界定模糊,使用上也不一致(徐國琦 1994)。也有學者從中國傳統「儒學」的角度批評,認為儒家強調兼容並蓄,不會與西方文明對抗(黎紅雷 1996)。王緝思(1995)編著的《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論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一書則是中國大陸學者反駁「文明衝突論」的集大成。面對中國大陸學者的駁斥,Huntington(1997)仍然堅持其「文明衝突」的論點。尤其在美國「911」事件發生後,他不諱言的指出,「美國現在的敵人和潛在的敵人是宗教驅動的伊斯蘭好鬥份子和完全非意識形態的中國民族主義(杭亭頓 2004, 282)。我們姑且不論爭辯的內容,僅就對話形式而言,說明中國大陸學界已從封閉走向開放。

表一：中國大陸設置國際關係科系的大學與研究單位分布情況

地區	數量	地區	數量
北京	16	廣東、河南	8(各 4)
上海	8	陝西、遼寧、吉林	9(各 3)
江蘇	7	天津、四川、雲南、安徽、河北、甘肅	12(各 2)
山東	6	福建、浙江、山西、新疆、廣西、黑龍江、江西	7(各 1)
湖北、湖南	10(各 5)	總計	83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 2007, 70。

表二：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的內容類別

理論研究	中國對外關係研究	世界政治研究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美關係	國際形勢與格局、恐怖主義
國際制度、研究方法	中—日關係	核武擴散
建構主義	中—俄關係	國際法
全球化與全球治理	中—非關係	全球化
國際安全、外交理論與思想、非傳統安全、英國學派、自由主義、國際體系	朝鮮半島問題、中—東南亞關係	文明與文化、多邊主義與外交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與學科的建立	安全與核武戰略	國家形象、人權、綜合國力、非政府組織、危機管理
區域主義與整合	外交政策與戰略、公共外交	愛國主義與民族運動、跨國傳播與國際輿論、對外援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 1990 年以來，儘管中國大陸對於國際關係研究有顯著進步的地方，然而仍有不足之處，最主要是欠缺理論的探討。倪世雄與趙可金（2007，61）兩位學者在回顧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歷史時指出，理論研究的不足是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他們綜觀中國大陸學者研究國際問題，發現有關國際形勢、對外政策的比較多，純理論思考較少。即使有理論的著作，也大多是關於解釋和闡述西方理論內在邏輯，真正從特定假設命題出發而建構理論的成果非常少。孫學峰（2000，4）曾以 1995 年至 1998 年四年期間中國大陸學者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美國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以及《外交學院學報》等六個主要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加以統計，發現在總數 1074 篇文章中僅有 197 篇為理論相關文章，佔總數 18.3%。另一個數據顯示，在十種主要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期刊中，對於理論研究的文章佔該期刊總數比例，最高約為 35%，最低則是 0%。（表三）

表三：2006年中國大陸主要國際關係期刊中的文章類型之比例

期刊名稱	各類文章所佔比例(%)		
	理論	經驗	其他
國際政治研究	30.88	55.88	13.24
國際論壇	29.90	68.04	2.06
國際觀察	14.70	67.65	17.65
歐洲研究	21.54	70.77	7.69
外交評論	22.68	65.98	11.34
現代國際關係	7.89	88.82	3.29
國際問題研究	0.00	92.59	7.41
美國研究	2.50	77.50	22.00
國際政治科學	18.18	36.36	45.46
世界經濟與政治	35.20	44.00	20.80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 2007, 71。

參、「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

當我們理解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研究發展中所呈現出進步與存在著缺失的同時，也注意到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問題。1984年6月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點，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這樣的論述開啟中國大陸學者試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之路。1986年9月王建偉、林至敏與趙玉梁等三人撰寫〈努力創建我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一文是首篇關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文章（倪世雄 & 許嘉 1997, 12）。1987年8月上海國際關係學會、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等多個學術單位共同舉辦首次關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至今，中國大陸學界探討「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繁多，舉辦過的相關研討會次數亦不少（見表四），他們關注的焦點議題乃圍繞在是否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如何建立之上。

表四：1987-2006 年主要「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的召開

時間	地點	主題
1987 年 8 月	上海	第一屆全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
1991 年 6 月	北京	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研討會
1994 年 5 月	北京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1994 年 11 月	北京	21 世紀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8 年 10 月	上海	第二屆全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
2000 年 6 月	上海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
2002 年 12 月	北京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比較與借鑒研討會
2003 年 9 月	北京	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研討會
2004 年 4 月	青島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研討會
2004 年 12 月	上海	第三屆全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
2006 年 4 月	天津	Peter Katzenstein 對話中國學者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是否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短暫的爭辯

雖然中國大陸於 1987 年 8 月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就曾討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議題，然而從出版的論文集來看，當時的重點在於如何運用馬克思、毛澤東的思想分析國際政治問題，以及對西方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介紹。對於何謂「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僅是輕描淡寫，內容性質充滿官方語言，缺乏實質討論（上海國際關係學會 1991）。到了 1990 年代初期，比較實質地討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議題，尤其在 1994 年 5 月於北京舉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與會學者曾激烈爭辯是否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當時研討會邀請北大國際政治系主任梁守德，針對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特色」問題進行專題報告，其內容包括說明為什麼需要建立「中國特色」、怎樣尋找「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特色」的具體表現等三個方面的問題。在解釋為什麼需要建立「中國特色」時，強調是為了服務於國家利益，並且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理論的道路。在說明怎樣尋找「中國特色」時，強調「四個必須」，即必須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必須正確確立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處理與

世界的關係；必須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必須繼承與發揚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最後，「中國特色」的具體表現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王聯 1994，45）。

梁守德的觀點引起與會學者的爭辯，可分為贊成派與懷疑派兩方。贊成派學者認為，「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命題是可以成立，理由是：第一、世界是客觀存在，有各自的特點。反映社會主義中國的世界觀、方法論；第二、中國大陸應該存在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外交政策服務的理論；第三、只有中國人才可能總結幾十年來，上千年來處理對外關係的實踐；第四、中華民族歷經滄桑，其對世界整體的看法，肯定能被世界大多數國家與人民所接受（王聯 1994，46）。

懷疑派學者認為，不需要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理由是：第一、國際關係理論是一種學術活動，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讓人直接聯想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意涵；第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學者已同各國進行學術交流，這是對「中國特色」的超越；第三、應盡可能使理論接近真理，從而為更多人所接受，如果冠上「具有中國特色」，顯然這種理論的目的是為中國人服務，不利中國大陸整體的發展（王聯 1994，46）。

針對懷疑派的論點，梁守德（1997，3）回應指出，「這些看法(懷疑意見)，雖然能夠理解，但均站不住腳。其實，不僅國際政治理論，而且所有社會科學理論，均有各國特色，甚至學派特色和個人特色，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事實上，贊成派與懷疑派之間的爭辯也僅於該研討會召開後的一、二年內，因為從最近10年裡中國大陸學者所撰寫的相關文章與專書，或者所召開的研討會內容來看，鮮少質疑與反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而那些原先持質疑態度的學者也變得保守，認為「這是個有待時間檢驗的問題」(蘇長和 & 彭召昌 1999，18)。換言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已成為共識。

二、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四種途徑

在短暫爭辯是否需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後，中國大陸學者必須面對「如何」建立的問題。基本上，他們提出了四種可行的研究途徑。⁴

第一種研究途徑是學習西方的實證主義。主張這種方式的學者認為，國際關

⁴ 中國大陸學者俞正認為，建立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有四個途徑：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關係的理論、新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及其實踐經驗、中華文化精粹以及外國國際關係理論（俞正 2005，5）。魯鵬認為，所謂建立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的四個途徑包括：美國的實證主義、英國學派、整個西方理論發展過程、中國傳統文化（魯鵬 2006，52-59）。兩者之間有重疊與差異，因此本文乃加以歸納整理出四種途徑。

係研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具備科學的屬性，所謂科學性來自於研究過程，應符合提出問題、假設、概念操作化、檢證、得出結論等科學程序，而不是研究成果的可接受性，科學方法對於理論的建立有決定性作用。雖然科學方法不能解決所有研究問題，不過科學方法可以解決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王勇 1994；崔志暎 2003；閻學通 2004a；閻學通 2004b；孫學峰 2004）。因此，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必須強調「實證方法」，否則論證基礎將是薄弱（王勇 1994，38-39）。閻學通（2004b，84-85）指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必須依賴「實證方法」，也就是採取科學研究方法，不幸的，中國大陸在這方面仍嫌不足。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可能與定量分析能力不足有關。第二，可能與無法掌握尋找新問題的方法有關。他進一步指出，「在我們所知道的研究方法中，還沒有甚麼方法比科學方法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國大陸學界對國際關係認知的精確程度。」

第二種研究途徑是借鑒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國際關係思想。主張這種方式的學者認為，由於中國大陸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甚遠，而毛澤東與鄧小平對於馬列思想既繼承又發揚光大，因此研究馬、列、毛、鄧思想時應該看作是整體性，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近期毛澤東、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為典範，也就是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到鄧小平「和平發展論」的結合（李濱 2005；馬渤 2006；張歷歷 1998；楊成等 2003）。此外，他們質疑「實證方法」（李濱 2004；張文木 2004；張文木 2004b），更不同意「方法論問題是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的第一要務」（李石生 1996，3）。對他們來說，任何研究都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的本質，國際關係研究亦是如此。李濱（2005，44）指出，「本國學者應該著重於國際倫理與世界正義倫理的研究。從理論上使人民相信建立一個美好、公正與和平的世界，社會主義是最好的選擇。」

第三種研究途徑是以中國傳統東方文化為核心。主張這種方式的學者認為，中國歷史文化比西方悠久，論及國際關係思想，中國比西方更早存在，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代。事實上，中國儒家、道家，法家或墨家文化中的許多思想可做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基礎（顏聲毅 1996；俞正梁 1996；葉自成 & 龐珣 2001；葉自成 & 王日華 2006；葉自成 2005）。例如在國際秩序的研究議題上，俞正梁（1996，73）指出，不論是儒家「四海之內皆兄弟」、墨家「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是追求事物的和諧與穩定，這對建立新世紀的國際秩序提供一種新的思考。如果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詮釋，使之更具現代精神，它將具有深遠的全球意義。葉自成（2005，68）指出，「我們不要對老祖宗的東西妄自菲薄，不要看輕中國古代的遺產。事實上，中國

歷史文化中有很多思想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相通，甚至有一些是西方理論中所沒有。」葉自成以外交思想議題為例，透過對春秋戰國時代的研究，歸納出屬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六種外交思想流派。(表五)

表五：「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思想流派

	霸權學派	仁義學派	自然學派	超限制學派	謀略學派	權力學派
代表人物	管仲	孔子、孟子	老子、莊子	文仲、范蠡	鬼谷子	韓非子
國際環境	險惡	險惡	險惡	極其險惡	極其險惡	極其險惡
暴力的作用	大	小	小	極大	大	極大
道德的作用	大	大	小	無	無	無
外交的目的	稱霸並維護周禮	孔子：重歸周禮 孟子：統天下	自然狀態	復仇與兼併	兼併/均勢	兼併
外交策略	禮、力並重	遵守周禮(或者仁義)	無為	陰謀	合縱、連橫	
對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結構現實主義與自由制度主義	理想主義	無	馬基維利主義	進攻現實主義與均勢理論	古典現實主義

資料來源：葉自成 & 王日華 2006, 129。

第四種研究途徑是學習「英國學派」。主張這種方式的學者認為，在既有國際關係理論中，「英國學派」自成一家的風格及其學術成就已經獲得包括美國學界在內的國際學界普遍認同。「英國學派」強調歷史與國際法，尊重文化與傳統的差異性，這對於「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建立是有啟發作用（任曉 2003,; 唐小松 2005; 王存剛 2005）。王存剛（2005, 51-52）指出，「英國學派」給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界的一個重大啟示是，「作為一個成長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希望在國際舞台上更有更大作為的文明古國，我們應當也必須有自己的、特色鮮明的、完整的國際關係理論。」任曉（2003, 70-71）曾提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應該向「英國學派」學習，因為「英國學派」第一、

走自己的路；第二、以學術志趣聯結同道，逐步發展學術思想；第三、重學術傳承；第四、注重以論文形式反映其研究成果；最後、鍥而不捨，努力不懈。

至今，上述四種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途徑仍在爭辯，當然也有學者試圖加以整合，例如秦亞青（2006），他尋求第三條路，也就是整合上述所提出的研究途徑，認為這些途徑並不相互排斥，是可以互補，因而促成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建立的可能和必然。

肆、「中國學派」之倡議：批評與肯定

現在，中國大陸學者所追求的不僅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而是更加期盼能建立「中國學派」。2004年12月在上海所舉行的國際關係研討會上，就以「建構中國理論，創建中國學派」為主題進行討論，與會者呼籲積極考慮創建「中國學派」（郭樹勇 2005）。對於「學派」的認知，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其係指「某一特定研究群體，他們的旨趣相似，理論導向相同，思想傾向相仿，學術風格相近，它是由學說師承不同、觀察事物角度不同、以及對現實與趨勢判斷不同而形成的學術派別」（俞正 2005，7）。在此情況下，多數中國大陸學者抱持著樂觀的態度看待「中國學派」的建立，其中一個典型的說法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研究西方理論並加以引進國內，至今中國大陸學者可說全面且透徹的了解先進歐美國家的理論，已符合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說體系，只有在中國大陸學者全面的透徹了解國外，尤其是在了解先進歐美國家有關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來（王逸舟 1998）。」這一段話的前項要件。建立「中國學派」，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必須經過三個階段的努力過程。第一階段是對話：即塑造自我階段。借助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址並使之現代化取得一種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權；第二階段是比較：即表達自我階段。大中華經濟圈、太平洋世紀、中國世紀等說法代表了中國文化表達東方國際關係體系的希望，其最終結果是比較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起；第三階段是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階段。並非因此推翻或取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而是創立表達自己國際體系的「中國學派」（王義桅 & 倪世雄 2002，22）。

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建立屬於自己品牌的國際關係理論，因為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不見得對全球事務都能提供合理的解釋（Mesquita 1981, 137-140）。然而，有權利是一回事，有能力又是一回事。一個學派從倡議到建立必須經歷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多依賴的是能力，其中主要表現在具有學派代表性人物、具有學派研究綱領、以

及具有與他派對話的能力等三方面之上。下文將從此三方面分析「中國學派」建立的問題。

一、代表性人物的問題

任何學派都有其代表性人物與思想，例如現實主義的 Hans Morgenthau、Kenneth Waltz、John Mearsheimer；新自由制度主義的 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英國學派」從早期的 Martin Wight、Hedley Bull、R.J. Vincent 到近期的 Barry Buzan 都是耳熟能詳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著作對於該學派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反觀，至今實難找出能代表「中國學派」的學者與著作，主要是大多數中國大陸學者意在儘快建立「中國學派」以凸顯出中國大陸的大國地位，而較忽略對思想的論述，或者有論述也僅是輕描淡寫而已。例如，梁守德（1997，5-8）曾指出，對於建立「中國學派」，首先要正確認知今天我們的國家究竟是甚麼樣的國家，並以科學界定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實際地位。他認為，目前中國大陸是在迅速發展中大國、是具有較強綜合國力的政治大國、是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國，因而提出建立「中國學派」的內容應包括：第一、以國家權利為核心，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突顯主權利益同強權利益的關係。第二、把生產力標準引進國際政治領域，確立經濟優先觀點，注意政治同經濟的相互滲透。第三、以改革促進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正確處理穩定與進步的關係，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然而，若與現實主義 Morgenthau 提出的「權力論」、新自由主義 Keohane 提出的「國際機制論」、還是「英國學派」Wight 提出的「三大傳統⁵」相比，梁守德的論述內容則太過於教條化，缺乏深入的理論剖析，難以引起西方學者對該議題的關注。

當我們批評大多數中國大陸學者為了凸顯大國地位而急於建立「中國學派」，導致缺乏理論論述和缺乏代表性人物之同時，也發現已有少數中國學者從理論層面分析「中國學派」建立的問題。如秦亞青（2005; 2006）所撰寫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兩篇文章即是一例。持平而論，從事理論研究者不必然能成為代表

⁵ 三大傳統分別為，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概念等同於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革命主義則相近於康德的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至於理性主義與近來美國學界討論的理性主義/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中的理性主義不同。Wight 的理性主義是現實主義與革命主義的媒介(via media) (Wight 1996)。

性人物，然而不從事理論研究者，其思想無法完整詮釋，而思想無法詮釋，也就無法成為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少數中國大陸學者的努力或許試圖說明了一件事，即是對於「中國學派」當前缺乏代表性人物的問題是可以批評，但不應該抱持太悲觀的態度。

二、學派研究綱領的問題

無論是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英國學派」都有其特色的研究綱領。以「英國學派」來說，Tim Dunne (1998, 5-11) 曾指出三個主要信條(preliminary articles)界定了「英國學派」的研究綱領，第一個信條是對特殊研究傳統的認同(self-identifi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tradition of enquiry)；第二個信條是詮釋的研究途徑(an interpretative approach)；第三個信條是規範性的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theory as normative theory)。在此基礎上，「英國學派」的研究議題至少涉及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對國家體系和國際社會發展歷程的歷史比較研究；第二、國際社會的規則、制度和價值基礎及其變化等社會學和規範層面的問題，包括國際社會中的倫理(人權)、國際法、國際機制、國際秩序以及人道主義干涉的法理與倫理；第三、對非殖民化過程和第三世界的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第四、國家的本質、國家主權以及意識形態和革命等一般政治理論問題；第五、與人類行為、政治實踐或治國有關的戰略與外交問題，包括外交制度與規則的演變、國際關係的實踐倫理以及均勢、軍備控制等戰略安全問題；第六、對該學派學術歷史研究，包括晚期學者對學派早期經典著作與人物的研究、與其他國際關係學派之間的探討 (Buzan 1999)。

反觀，儘管如前文所觀察到的，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國際關係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仍不足以建立「中國學派」，因為缺乏像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或者「英國學派」那樣有一個明確的研究綱領。面對此困境，中國大陸學者試圖解決。2004年12月在上海舉行的「建構中國理論，創建中國學派」研討會上，與會大多數學者對於建立「中國學派」達成若干的共識，認為建構中國大陸的國際政治理論，應該結合國家情勢與世界情勢，並且要確定新的主題與觀察的角度。其中，所謂新觀察的角度，主要是將西方的「權力政治」觀點轉變為「權利政治」觀點，而權利應以人為本、以法為準、以力為基 (郭樹勇 2005, 60)。從研討會的共識中似乎透露出「權利政治」將成為「中國學派」建立其研究綱領的基石。早在2000年梁守德 (2000) 曾撰文探討「權利政治」為「中國學派」研究綱領的問題，之後秦亞青 (2004) 也做相同的研究，因此中國大陸學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然而若要進一步評斷「權利政治」是否能為該學派的研究綱領尚嫌太早，因

為整體而言，僅管中國大陸學者對於「權利政治」已有深入的探討，不過著重在國內權利政治的部份，例如保障農、民、工的政治權利（李琦，1997；張麗紅，2005；宴瓊，2007；尹娜，2008）。相較之下，把「權利政治」議題帶進國際政治的研究中，僅是處於初步嘗試階段，因此，需要更長時間觀察才能比較客觀的評斷。

三、與其他學派對話的問題

過去幾次西方重大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辯告訴我們，學派之間的對話乃基於其研究綱領，甚至各個學派的代表性學者也會挺身而出為所屬學派進行立場的辯護。若從此觀點分析，由於「中國學派」缺乏明確研究綱領，因此尚不足於在「中國學派」架構下論及與其他學派的對話。然而，當我們批評之餘，也注意到中國大陸學界與西方學界因「議題」進行對話的事實，如過去的「文明衝突」議題，以及今日炙手可熱的「中國崛起」議題。有關「文明衝突」在前文已論述過，至於「中國崛起」，西方國際關係學派有不同的認知。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存在衝突與對抗的本質，所以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必然使其他國家的安全備受威脅，這是國家的安全困境。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的成長必然帶來其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也必然促使其在自己的邊界之外追求權力和行使權力。因此，「中國崛起」對其他國家安全、國際秩序與穩定構成威脅（Goldstein 2005, 81-92）。自由主義則認為「中國崛起」可能構成威脅，也可能不會，不會的理由是國際間的互賴程度越來越高，中國大陸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將損人不利己，更重要的，國際機制將對中國產生一定程度的外部約束力量（Goldstein 2005, 93-101）。

面對西方不同程度「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中國大陸學者提出「和平崛起論」(peaceful rise)的觀點來加以回應。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2005）曾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撰文談論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問題。他指出，各種數據顯示，我們正在崛起。不過，我們將會是和平崛起，而且對世界的影響也會是正面性。我們不會像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採取侵略、殖民、擴張，甚至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相反，我們將以和平方式(peaceful means)崛起，將與國際社會接軌，不會尋求在世界事務上的霸權或支配。龐中英（2004）也強調，我們要成為世界上和平國家，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和平是我們外交的旗幟，也反映了我們的價值。因此，和平不僅是我們崛起的手段，同時也是崛起的根本目的。「中國崛起」應該帶來和平與國際合作，而不是更多的戰爭與國際衝突。

2004 年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出版《中國和平崛起》一書，試圖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適當的理論基礎，並在「和平崛起」的框架下探討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和台灣問題。該書開宗明義的強調，「中國崛起」與過去西方大國的崛起不一樣，前者尋求和平崛起而不是採取對抗的戰爭道路，在參與國際秩序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一個負責任的區域大國角色，與其他大國有共同利益與穩定良好的關係（江西元 & 夏立平 2004，1-10）。

總而言之，透過分析「中國學派」與其他學派對話的問題可得兩個簡要的結論。其一，缺乏明確的研究綱領下，「中國學派」與其他學派的對話僅能被動的回應而無法主動提出議題。其二，儘管存在前述問題，「中國學派」與其他學派的對話至少說明中國大陸學界的開放性。

陸、結 論

針對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發展，中國大陸學者蘇長和（2005，28）曾指出，「國內這二十年國際關係研究，在研究的問題上主要以模仿為主，而在模仿性的研究中，又主要以跟從美國為主。...在學科發展的初級階段，模仿可以盡快縮小與學科領先者的差距，但是長遠來說，這樣做永遠不能超越別人，只有讓別人在理論與研究的問題上能夠模仿你，那麼你才能占據前沿位置。...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已經走過對西方理論的吸收與消化階段，要在國際關係學界有中國自己獨立的聲音，我們必須以科學、嚴格的態度去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最終提出自己的概念與理論來。」事實上，蘇長和的論述已充分表達出絕大多數中國大陸學者的心聲，現在他們正積極從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以及「中國學派」。有四種途徑，分別為學習西方的實證主義；借鑒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國際關係思想；以中國傳統東方文化為核心；學習「英國學派」等等是中國大陸學者建立「中國學派」的依據。

站在學術立場，我們很樂見「中國學派」的建立，因為能多一種提供分析問題的不同角度。然而，誠如中國大陸學者蘇長和（2003，29）所言，「學派不是自封的。」滿懷這種高度期待之餘，也必須正視建立「中國學派」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缺乏一個明確的研究綱領，以及具代表性的學派人物。倘若這樣的問題未能為主張建立「中國學派」者所克服，那麼「中國學派」將是一種口號、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

參考書目

- 上海國際關係學會編。1991。《國際關係理論初探》。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尹娜。2008。〈弱勢群體政治權利分析〉。《理論研究》。4：33-34。
- 王逸舟。2004。〈中國國際關係學：簡要評估〉。《歐洲研究》。6：137-149。
- 王逸舟。1998。〈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資中筠主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緝思編。1995。《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論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聯。1994。〈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綜述〉。《國際政治研究》。3：44-47。
- 王勇。1994。〈試論建立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證方法：兼評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4：34-39。
- 王義桅、倪世雄。2002。〈論比較國際關係學及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開放時代》。5：17-23。
- 王存剛。2005。〈可借鑒的和應批評的：關於研究和學習英國學派的思考〉。《歐洲研究》。4：48-52。
- 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2007。〈2006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綜述〉。《世界經濟與政治》。5：68-79。
- 任曉。2003。〈向英國學派學習〉。《世界經濟與政治》。7：70-71。
- 李琦。1997。〈公民政治權利研究〉。《政治學研究》。3：35-40。
- 李石生。1996。〈關於國際關係學建設的幾個問題〉。《外交學院學報》。3：1-4。
- 李濱。2004。〈科學方法論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世界經濟與政治》。11：19-24。
- 李濱。2005。〈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5：37-44。
- 周恩來。1990。《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程克雄譯。2005。《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
- 胡錦濤。2003。〈創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384226.htm>。2003/8/13。

- 俞正。2005。〈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創建中國學派〉。《上海交通大學學報》。13(4)：5-8。
- 俞正梁。1996。〈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國際政治新秩序〉。《學習與探索》。4：73-76。
- 徐國琦。1994。〈杭廷頓及其文明衝突論〉。《美國研究》。1：102-121。
- 馬渤。2006。〈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指導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48：45-47。
- 宴瓊。2007。〈論我國公民的政治權利〉。《法制與社會》。1：647-648。
- 倪世雄、許嘉。1997。〈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歐洲》。6：11-15。
- 秦亞青。2004。〈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5：1。
- 秦亞青。2006。〈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3：1-12。
- 秦亞青。2005。〈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骨社會科學》。3：165-176。
- 唐小松。2005。〈英國學派的發展、貢獻和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7：21-27。
- 孫學峰。2000。〈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現狀分析〉。《國際關係學院學報》。1：3-9。
- 孫學峰。2004。〈重視研究設計是提高研究質量的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1：28。
- 梁守德。1997。〈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1：1-9。
- 梁守德。2000。〈國際政治中的權利政治與中國國際政治學的建立〉。《國際政治研究》。4：1-11。
- 郭樹勇。2005。〈創建中國學派的呼籲：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綜述〉。《現代國際關係》。2：59-61。
- 崔志暎。2003。〈淺析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在方法論上的影響〉。《國際政治研究》。1：128-135。
- 張麗紅。2005。〈農民工的政治權利探析〉。《理論與現代化》。1：21-24。
- 張文木。2004(a)。〈歷史邏輯與國際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1：27-28。
- 張文木。2004(b)。〈國際關係中的歷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1：85-88。
- 張歷歷。1998。〈試論鄧小平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外交學院學報》。4：37-41。

- 張歷歷。2003。〈新中國外交學學科建設與研究〉。《外交學院學報》。3：36-43。
- 程毅、楊宏禹。1991。《國際關係理論基礎》。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楊成等。2003。〈毛澤東國際關係價值取向初探〉。《理論月刊》。3：33-34。
- 葉自成。2005。〈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中國視野〉。《外交評論》。82：64-71。
- 葉自成、龐珣。2001。〈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與西方的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12：24-29。
- 葉自成、王日華。2006。〈春秋戰國時期外交思想流派〉。《國際政治科學》。2：113-132。
- 趙可金、倪世雄。2007。《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魯鵬。2006。〈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世界經濟與政治》。6：52-59。
- 黎紅雷。1996。〈儒學與當代文明的融合：兼駁文明衝突論〉。《現代哲學》。43：88-91。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 http://202.152.185.85/resource/article/2007/0430/article_15.html。2007/4/30。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 http://202.152.185.85/resource/article/2007/0430/article_16.html。2007/4/30。
- 閻學通。2004(a)。〈國際關係研究中使用科學方法的意義〉。《世界經濟與政治》。1：17。
- 閻學通。2004(b)。〈科學方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82-85。
- 蘇長和、彭召昌。1999。〈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貧困：對近20年國際關係學在中國發展的反思〉。《世界經濟與政治》。2：15-19。
- 蘇長和。2003。〈問題與思想—談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3：28-30。
- 顏聲毅。1996。〈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外交的影響〉。《國際觀察》。2：5-8。
- 蘇長和。2005。〈為什麼沒有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國際觀察》。4：26-30。
- 龐中英。2004。〈中國崛起的「和平性」判讀—關於「和平崛起」的理論性問題〉。《國際觀察》。3：1-8。
- Buzan, Barry. 1999.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ocuments.htm
- Dunne, Tim. 1998.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aerts, Gustaaf and Men Jing. 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Global Society*. 15(3): 251-276.
- Hoffman, Stanly. 1977.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3): 41-60.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7.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76(5): 28-49.
- Mesquita, Bucno de. 1981. *The War Tra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95.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ed.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ong, Xinning. 199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uilding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s*. 49: 40-58.
- Song, Xinning. 2001.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 61-74.
- Wight, Martin. 1996.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Zheng, Bijian(鄭必堅). 2005.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5): 18-24.

(投稿日期：97年11月25日；採用日期：98年2月24日)

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與「中國學派」之倡議